



文明更迭的宗教考古學

韓思藝、張 鋈 中央民族大學

小引

《翦商》一書問世不久後便引發了學界內外的熱議，之後更榮獲豆瓣 2022 年度歷史·文化圖書、第十八屆文津圖書獎、2022 年度刀鋒圖書獎等諸多獎項。該書運用王國維所提的「二重證據法」，將「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相結合重新梳理了夏商周三朝人祭風俗的生成消亡，認為人祭的消亡和周滅商有直接關係，這甚至還引發了華夏文明的關鍵轉型與新生。《翦商》以大開腦洞的思維和自洽的邏輯將讀者帶入上古時代的文化時空中，同時也以獨特的視角引發

另一種思考，即商周更迭之際周公對於人祭制度的廢除，實際上是背後的信仰文化元素促成的轉變。而這一轉變過程若與聖經中以色列人進迦南的歷史過程相對比，可以發現前者通過清除人祭制度而走上了有神論的人文主義，在宗教上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後者則以律法、禮儀和教化在內的新的宗教，取代了通過宗教儀式操縱神靈的人祭制度等舊的宗教傳統。沿著福柯開闢的知識考古學進路，我們可嘗試從宗教考古學的進路探討文明進程中的宗教問題。

一、華夏文明進程的宗教考古學

一般來說，人祭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把人夯築在地基內，用作建築物的奠基，可稱之為「人奠基」；二是把人作為食物或僕役獻祭給神或祖先之靈，這是狹義的「人祭」；三是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可稱之為「人殉」。^[1]據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已存在人祭行為並逐漸增多，直至商朝呈現爆發式增長，如殷墟留下了大量堆滿屍骨的人祭坑，人祭行為至此達到頂峰。《翦商》一書的前半部分根據大量的考古資料，系統而細緻地闡釋了人祭現象

在早期華夏文明的出現和發展。

首先是新石器中晚期的人祭現象。從考古遺址可看出，隨著早期社群規模的不斷擴大，新石器中晚期大致出現了從村落、部落到早期國家的發展趨勢。進一步對比不同作物區遺址又可發現，在一些對水利設施、集體協作能力比較依賴的稻作物區，如長江區域陸續發掘出的多座約 5000 年前的「古城」，聚落雖在不斷擴大但較少出現人祭現象；而較少依賴群體協作的旱作農業區則人祭現象比較興盛，如在黃河流域中河南王城崗古城、陝西神木石峁古城、山西襄汾陶

摘 要：《翦商》一經出版就引發學界熱議，該書以人祭現象為歷史線索，不僅勾勒出早期華夏文明的發展與更新的基本脈絡，更揭開了商周更迭之際廢除人祭背後的歷史真相，認為這一文明變遷的背後有著更為深層的信仰文化因素。這一信仰「革命」並非孤例，通過考察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考古史，同樣引發了信仰與人類文明進程的關係探討。人類文明的進程，並非如孔德所預測的經歷三個階段，相反在人類社會的每個階段都會有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科學。知性失序的問題不是因為神學與形而上學，而是知性跨越其界限而導致的。因此，文明的進程不是實證科學對於神學和形而上學的驅逐，而是天人秩序的確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人文精神的展開與科學精神發展。

關鍵詞：《翦商》；人祭；宗教考古學；天人秩序

寺古國宮殿區發現了大量人奠基坑以及批量處死的屍骨。^[2]

然後是夏朝時期的人祭現象。在對疑似「夏都」的偃師中遺址考古中發現，二里頭一期處於部落階段；二期有了宏大建築，墓葬在宮殿庭院內且沒有隨葬兵器，鑄銅作坊則在新建或翻修的時候有埋人現象，旁邊亦有埋入人祭屍骨的祭祀坑；三期增加了很多高等級建築，在一處院落發現了用人祭祀的跡象，宮殿區的大型祭祀場沒有發現人祭，屬於三期四期的宮城外的墓葬區也沒有殉葬人，但祭祀場旁邊的灰溝有人祭遺存。考古發掘表明，二里頭的人祭行為並不氾濫，各期墓葬沒有發現殉葬人，宮殿區也沒有發現人奠基，只在院落中發現了五具獻祭屍骨。由此，可以說，二里頭一夏朝的民間雖存在人祭風俗，但尚未建立以人祭為基礎的「國家宗教」。^[3]

商朝的人祭現象可分成早、中、晚三期，商湯（武王）帶領商人攻滅夏朝後，另建了兩座聚落，現被稱為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從這兩處遺址可以觀察到早商時期祭祀行為的變化軌跡。

「商朝開國 70 年內偃師宮殿區的祭祀遺存，明顯繼承了夏都二里頭宮殿區的祭祀禮儀，以埋豬祭祀為主，沒有人豬混埋現象，甚至用工程取土坑作為埋祭場的做法也被模仿了過來。」^[4]到開國近百年時，祭祀區出現了用人和牲畜獻祭的各種形式的祭祀現場和祭祀坑，使用了約半個世紀；到第三期，祭祀活動主要集中在某一區域，除了宮殿區的祭祀區之外，宮殿之外的平民區也有各種祭祀遺跡，說明平民中的殺人獻祭現象也隨著宮殿區人祭的普及逐漸蔓延開來。鄭州商城前三期與偃師商城基本同步。

綜合偃師和鄭州兩城的祭祀歷程可見，「在商朝一期（最初 70 年），宮廷和民間祭祀以豬為主，用人的現象很少。商朝二期（開國 70-140 年間），偃師的王宮區開始批量用人獻祭，鄭州的普通商人族群也出現大量人祭現象，用牲畜祭祀的現象繼續存在。商朝三期（開國 140-200 年間），兩城宮廷和民間的人祭數量空前增加。」^[5]總的來說，商朝開國百年，王室開始大量殺人獻祭，從而在偃師和鄭州商城的宮殿區形成密集的人祭遺存，這也意味著人祭成為商朝的國家宗

教形態。這是商朝早期人祭現象的發展歷程和主要特點。

接著看商朝中期。剛剛進入中商階段時，鄭州商城出現了一種全新的祭祀方式——埋藏青銅器。這種擺放器物並埋藏祭祀的活動，在古老的新石器時代曾有先例。考古發現鄭州商城第四期初葉發生嚴重蕭條，加之此地發掘出的銅器窖藏坑以及王宮區大量即將鑄制完工的頭蓋骨成品被投入壕溝埋葬的現象，可引出一種合理猜測，商朝開國 200 年左右時，某位商王可能曾試圖改革人祭宗教，用埋葬器物獻祭代替殺人和殺牲。然而，這場「埋祭改革」使得商王室內部爆發了激烈衝突和戰爭，結果各地大大小小的商城也相繼淪為丘墟，這段蕭條期屬鄭州商城第四期。九世之亂後，鄭州商城逐漸被毀棄，小雙橋則成為商王朝唯一的繁華都邑。從發掘跡象看，小雙橋聚落存在時間不長，規模也不太大，但已發現很多人祭屍骨，且有殘酷的人祭儀式，說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數量空前增加，屠殺方式也越來越殘忍。

再看商朝晚期。商王朝前後存續五六百年，殷商存在了約兩個半世紀，因此學界也稱之為「晚商」。根據現代考古，盤庚遷都實是從鄭州小雙橋遷到安陽殷墟（殷都）。商人在洹河南岸營建了新的王宮區，多數族邑聚落也都坐落在洹河以南，這便是後世著名的「殷墟」。殷墟出土了大量的商王占卜刻字甲骨，發掘出王宮、王陵和多處商人的族邑及墓地。「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區發現 2000 餘座歷代商王奉獻的祭祀坑，已經發掘約 1400 座。根據 2013 年對舊坑的抽樣核對，每座坑內有十名人牲。保守起見，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計，人性數量也會超過一萬名。這還只是王陵區批量祭祀坑中的人性，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宮區的各種人性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性和殉葬人等，因材料分散未列入統計。」^[6]可見王陵區人祭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王室之下的貴族，其人祭和人殉雖然不如王室集中，但分佈範圍更廣。在殷都存世的二百多年間，商人族邑的人祭、人奠基和人殉坑越來越多，多處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殺的跡象^[7]，如在路北祭祀坑區的一小部分發掘中發現祭祀坑 18



處，包含大量被肢解的人和動物的骨骼；在殷都王宮區向東數百米的洹河對岸的大司空村，考古隊發掘了 354 座中小型墓，其發掘報告展示出獻祭似乎已經是一種公共的儀式和典禮。^[8]總之，「伴隨著聚落規模的擴大，殷商時期人祭和隨意殺戮現象同步增長，並在殷墟末期達到頂峰。」^[9]

最後是西周及後世的人祭遺存現象。殷商晚期，文王和武王父子開啟了翦商大業。武王攻滅殷商王朝後，並未立即廢棄殷商的祭祀傳統，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其宗教思維與祭祀儀式。如武王在殷都設立了周廟，用商人典禮祭祀上帝以及周族的列祖列宗。此外，武王還在周廟舉行盛大的燎祭，將紂王的舊黨砍斷手腳、砍去頭顱進行獻祭，將紂王及其餘人頭都扔到火堆中焚燒，產生的煙氣升入雲端意味著上帝在天界享用祭品。考古展示的商代各種人祭遺存和甲骨文記錄，為《逸周書·世俘解》中記述武王祭祀的內容提供了佐證，可以說，武王的人祭大典完全繼承了商代的人祭和牲祭傳統。但是，在周公主政時期，有著上千年傳統的人祭和人奠基習俗迅速地消失了，只有洛陽的「殷頑民」頑固堅持了一兩代人的時間。相比人祭和人奠基習俗，人殉風習更加頑固，一直延續了近百年，但最後還是消亡了。

二、華夏文明進程中的神聖敘事

如前所述，周朝建立後，新石器晚期已存在的人祭現象在周公主政時期迅速消失，後世如春秋時期雖出現復活跡象但再未能成為歷史主流。人祭現象在早期華夏文明的出現和發展引發了諸多探討，不同於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人祭是逐漸、自然、不知不覺地退場的，《翦商》一書通過對考古資料、甲骨卜辭及《易經》的分析，將人祭風俗的消亡歸因於周朝幾位開創者，尤其是周公旦的努力。

首先，人祭現象在周朝的消失與周族的來源與興起有特定關係。通過考古殷墟中的甲骨卜辭，再結合《詩經·大雅》中《生民》關於周族的記載，周族是從羌人繁衍出來的。這支姬姓周族在武乙王統治期間定居在周原，成為商朝的附庸，為商朝捕獵供商王獻祭的人牲。「商與周的

這種關係，……可能持續到滅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10]周昌年輕時經常率部外出捕獵羌人，後來還開始研究占卜、祭祀、通靈等巫術。紂王召周昌押送俘虜到殷都時，他一方面目睹了商人的各種殺俘獻祭儀式，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商王占卜和刻寫卜辭的過程，並私自學習通神占卜之術。從文王大宅中兩座窖穴發掘出的甲骨刻辭，一些是關於如何捕獵俘虜的，有一些竟是祭祀商朝先王的，如「甲骨 H11:1 記載，癸巳日占卜如何祭祀『文武帝乙宗』（紂王父親帝乙的宗廟）」^[11]，這些卜辭與殷商有明顯不同，也不是從殷商帶回來的，印證了周文王模仿商人刻寫卜辭的猜測。獻祭伯邑考後，紂王恩准周氏父子返回周邦，此次在殷都的經歷引發了周氏父子對人祭宗教的巨大恐懼。

與此同時，周文王在《易經》中記載下很多商代捕俘及人祭有關的內容，並且發現了一種「易」的思維方式，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永恆和持續不變的，它們都可以有另一種相反的存在形式。^[12]也就是說，從「易」的思維方式來看，雖然當初上帝指示和支持商人滅夏建商，但上帝的心意也是可以更改的，周族也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下滅掉商朝。^[13]因此，基於周族人對人祭風俗的排斥與恐懼，加之周昌對「易」的思維方式的篤信，使得周昌萌生了率領姬姓周族攻滅殷商王朝的翦商計劃，為消滅人祭宗教提供了現實基礎。

其次，人祭的消失與周昌父子對殷商「上帝」概念的重新詮釋有密切關係。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世間一切都被天界的鬼神主宰：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和諸神獻祭，從而得到天界的福佑，因此和商朝作對，就意味著違反鬼神世界的意志，不可能成功。^[14]周昌重新詮釋和利用商人的「上帝」概念，把土著部落普遍信奉的自然神（如天神）和商人的上帝捏合在一起，不僅宣揚自己能和上帝交流，還擅長占卜和易卦占算。^[15]《詩經·大雅·皇矣》也記載了周昌改造過的上帝：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位置。文王西顧，此維與宅。」

在這裡，上帝是一位居住在天界且監察人間的神靈，秩序混亂的王朝（如商朝）使上帝感到

厭惡，而恭謹有德的周族人，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可以說，周文王借助周人傳統中對「天」的崇拜，將商人的上帝概念引入周族，把商人的上帝闡釋成普世的上帝，使自己成為上帝在周族和人間的代言人，也使得上帝和「天」成了可以互相替換的概念，上帝的命令即是「天命」。^[16]

周昌死後，其子繼續著他的翦商大業。在此過程中，「周公重新定義了『德』與『上帝』的概念，『德』不再是《尚書·盤庚》裡商人的那種無原則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間的客觀道德律，如孝悌長幼、中正恭遜、寬宏溫直等。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會替換掉那種沒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戰勝商王。」^[17]在征伐過程中，武王在《尚書·泰誓》中歷數商紂的種種惡行，並且指控紂王不敬神，為其攻伐殷商尋求一種宗教合法性，「他是代表天上的上帝和諸神（歷代商王）懲戒紂王，正所謂：『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18]最終，武王攻滅了殷商王朝，建立周朝。周昌父子對「上帝」概念的改造扭轉了殷商人祭宗教中人取悅「上帝」的方式，為周公徹底清除人祭現象提供了思想基礎。

最後，人祭現象的消失與周公輔政期間實行的一系列措施有直接關係。為了徹底消除人祭行為，周公大致採取了三方面的措施，一是拆分商人族群，毀滅殷都，防止商王朝與人祭宗教的復辟。平定內部叛亂後，周公要求「殷頑民」搬出殷都，拆分了商人族群，並系統而全面地毀滅了殷都，燒毀後的城邑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無數的甲骨卜辭，以及那些獻祭殉人和奠基人牲。此外，周人還挖掘了商王陵區的幾乎所有高級墓葬，連同十幾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毀滅性破壞，劫掠和破壞完墓穴之後，盜坑又被填埋變成平地。^[19]

二是分封諸侯國，廢止商朝的人祭文化。為了鞏固新征服的東方地區，周公把周人派遣到東方，建立一系列諸侯國，實行文化改造，剷除商人血祭宗教的遺留，使其徹底同化於周人的文明。^[20]「周公執政時期不僅禁止人祭、人奠基和人殉行為，還禁止在書面文獻中提及商人的這些

風俗。」^[21]目前已經發掘的西周遺址墓穴裡有或多或少的隨葬品，但不再有獻祭的大量屍骨。^[22]

三是以新的宗教道德體系替代人祭行為背後的宗教價值體系。商人的血祭宗教背後隱含著一種弱肉強食的宗教價值體系，周公不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繼承這種宗教文化，而且發展出一套新的歷史敘事、道德體系和宗教理念。他提出王朝興亡更替背後雖都有天—上帝意志的改變，但唯一能影響天命的因素，是人的「德」，於是「天命」成為一種更為抽象的道德規訓。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這樣才會受到「天命」青睞，否則天命就會轉移。

最終，商朝殘酷的人祭行為被人為地從歷史中消除與隱去，以殺戮和人祭為特色的華夏舊文明從此被周公營造的以「德」和「天命」為主要特徵的新華夏文明所替代。由此可見，殷周之際朝代更迭、文明變遷的背後有著更為深層的信仰文化因素，而這種文明進程背後的信仰「革命」在人類歷史中並非孤例，以色列人進迦南的歷史可與之作對比互鑒。

三、猶太人進迦南的宗教考古學

在聖經敘事中，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帶領下逃出埃及，經過四十年的曠野流浪，直至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征服迦南，成為一個「有土地的」民族。從宗教意義上來看，這一神聖敘事隱含著以色列人與上帝之「應許——實現」的神人關係。^[23]近年來，關於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考古學研究已有諸多發現，若從宗教考古學的進路來分析以色列人進迦南的歷史敘事，有助於了解早期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區的真实處境，亦可從另一角度看到信仰文化因素在文明進程中的獨特作用。

迦南地區通常指沿地中海東岸的一片區域，西邊是地中海東岸，東邊是約旦河谷，中部是一片中央山地，山地往南是一片較平坦的丘陵。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之前，《聖經》記述迦南地區居住著腓尼基人、亞摩利人、基尼人等，這些人被統稱為迦南人，迦南人實際上是一個語言、宗教和族群都多元化的群體。1926年在敘利亞北部沿海發現了一批青銅時代晚期約公元前1550-1200年的古代烏加列文泥版，上面記載了烏加列



文明的神話、宗教與崇拜儀軌，^[24]可從中窺見迦南地區某些宗教的部分形態。

迦南人的宗教是一種多神教，其中最高神是「伊勒」，伊勒神有女性伴侶，名為「亞舍拉」。此外，巴力神是雷雨之神，常被用「公牛犢」的形象來象徵他的力量和豐產，其伴侶女神是「亞娜塔」。鐵器時代 I 期中央山地的村莊中曾發現一處帶有青銅牛犢像的高岡祭壇，考古學研究也進一步證明了牛犢像正是迦南宗教巴力神的象徵。^[25]在迦南人看來，巴力的死而復生是自然之季節循環的象徵，神的力量與自然現象是合一的，性愛在自然循環中也會決定著農作物之生長，因而迦南人會在神廟中通過對巴力與亞娜塔間的性愛和其與死神征戰的儀式化表演，來促進土地的豐收。^[26]

如上所述，迦南地區的宗教會通過儀式的方式實現人與神之間的溝通，並試圖通過人的儀式活動來控制神靈。《聖經》對信奉迦南別神極力排斥，如「為自己鑄了兩個牛犢的像，立了亞舍拉，敬拜天上的萬象，事奉巴力……耶和華向以色列人大大發怒」（王下 17:16-18），這一方面表明以色列人對迦南宗教的態度，一方面也證明了迦南地區廣泛存在的巴力神崇拜。此外，迦南人的宗教中還有獻祭（甚至人祭或童祭）的習俗、崇拜死人的習俗以及占卜，觀看動物臟腑來預測吉凶等。^[27]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帶領之下逃出埃及，前往「應許之地」——迦南地區。」據《聖經》記載，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這一「應許之地」前曾在曠野生活四十年，這一時期以色列人為人們呈現了一幅關於信仰、律法及崇拜禮儀的操練圖景。如《出埃及記》中耶和華頒佈了十條誡命，賜給以色列人道德、民事和宗教的法律，吩咐以色列人製造約櫃，建造會幕和安排敬拜等事，並且訂立有關祭司的制度和崇拜的條例，與以色列人立約，「你們不可為我製造偶像，不可為自己造任何金銀的神像。你要為我築一座土壇，在上面獻牛羊為燔祭和平安祭。凡在我叫你紀念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裡賜福給你」。（出 20:23-24）

《利未記》中耶和華規定了以色列人在敬拜

時和日常生活中應遵守的敬拜及生活規例，如燔祭的條例、平安祭的條例、贖罪祭的條例、祭司的條例及其在獻祭中的責任、日常生活事務的條例等；在《民數記》中耶和華在進攻迦南的過程中吩咐以色列人遵守獻祭的條例，規定以色列人在日常和節日節慶時的祭例，在摩押平原藉著摩西再次吩咐以色列人遵從耶和華的命令和典章。

《申命記》中摩西向新一代以色列人重新解釋律法，為未來進入迦南而發出勸告和警戒，「他將所吩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你們，就是十條誡命，並將誡命寫在兩塊石版上。那時，耶和華吩咐我將律例典章教導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申 4:13-14），此外還有大量要求以色列人遠離迦南別神的命令和誡命，「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亞舍拉，砍斷他們神明的雕刻偶像，……你們不可那樣敬拜耶和華——你們的神」（申 12:3-4）；再如「你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星象的、行法術的、行邪術的、施符咒的、招魂的、行巫術的和求問死人的。凡做這些事的都是耶和華所憎惡的……」（申 18:9-14）

關於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島與內格夫沙漠地區的流浪敘事的真實程度，考古發現的諸多宗教遺址可以證明這些地區曾有很多族群和他們生活的區域，如在南部內格夫和東西奈地區，發現了 142 處豎石崇拜，這在《聖經》中有類似的記載，「你若為我築一座石壇，不可用鑿過的石頭，因為你在石頭上動了工具，就使壇污穢了」（出 20:25）^[28]此外，根據一幅在阿布辛貝神廟（Abu Simbel）的壁畫，公元前 1275 年拉美西斯二世在遠征基低斯時，就居於會幕之內，這一長方形的接見會幕，形制和規模都接近聖經所講的以色列會幕；「弗萊明（D. Fleming）與基慶（K. Kitchen）還從公元前 18 世紀的馬里（Mari）和公元前 13 世紀的烏加列文獻，找出相關證據表明：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曠野中所用的會幕，廣泛見諸於公元前二千紀的古代近東世界」。^[29]再有，1930 年代考古學家們在約旦河流域的挖掘表明了以色列人在約旦河流域遭遇摩押和以東人是有可能的，這也為曠野敘事增添了進一步的考古

學證據。

在以色列人攻打迦南的過程中，約書亞還通過聖約更新儀式來堅固以色列人的信仰，「築壇、獻燔祭和平安祭、抄寫並宣讀律法、以色列人聚集聽法」^[30]。經過四十年的曠野生活，以色列人終於進入迦南地區。然而，支派間的內部紛爭、非利士人的侵襲都使得以色列人難以安定，這一時期雖時有士師出現拯救以色列人，但在非利士人的巨大威脅下，以色列人逐漸意識到應立一位王來進行治理，於是，掃羅被士師撒母耳挑選為以色列人的第一個王，但掃羅因違背耶和華遭到離棄，大衛成為第二任國王。大衛在政治、宗教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加強以色列的統治，他不僅統一了以色列的各個支派，擊退了非利士人、亞捫人和亞蘭人，大大擴充了以色列的疆土，保證了以色列國的安全與穩定；還建都耶路撒冷，將耶和華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象徵——約櫃接到耶路撒冷，將分散各地的神廟祭祀都集中到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全體以色列人認可的宗教中心。

大衛去世後，其子所羅門在耶路撒冷修建聖殿，將約櫃放入聖殿，他向耶和華祭獻聖殿的禱文將聖殿稱為「耶和華的名」居住的地方，使人在聖殿所做的祈求能直達天上的耶和華，「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祈禱的時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聽，垂聽而赦免。」（王上 8:30）

「在古代近東傳統中，一個王國的建立被認為是其神靈戰敗所在國的神靈所致，而其標誌就是在當地修建一個屬於他的聖所。因此，在本屬迦南人的耶路撒冷修建耶和華的聖殿，迦南神巴力的能力都被耶和華所具備，表示耶和華已經徹底擊敗巴力神，也代表以色列人對迦南的完全佔領。」^[31]最終，有形的聖殿以及圍繞著聖殿而衍生的崇拜禮儀成為以色列的宗教和國家生活中的中心。

關於大衛王國的歷史真實性問題，考古學研究也給出了諸多證明，甚至不少考古學家認為，考古發現能與聖經文獻一起形成較強的「二重證據」。首先，1993 年在以色列北部但城發現了一塊石碑，上面用亞蘭文講述了亞蘭王入侵以色列的歷史經過，其內容中以大衛家來指稱南國

猶大，由此可見大衛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19 世紀死海東部地區出土了一塊被稱為「摩押石碑」的碑刻，上面記載摩押王反抗暗利王朝的統治時也多次提到大衛，可見大衛王朝在巴勒斯坦地區已廣泛地被人所知。其次，對鐵器 II 期前段即公元前 10 世紀以色列地區的聚落模式的考古，可發現聚落出現城市化和集中化的趨勢，遺址中的防護設施和大型建築和考古器物的分佈都從側面證明了一個區域較廣的統治王朝的存在。再次，以色列地區的葬俗在這一時期也較為同一，而且在內格夫高原中部發現的聚落群和堡壘，更像是為保護南部邊境而設立，這傾向於證明統一王國對於南部的滲透與控制。最後，聖經對統一王國的行政體系的描述，與上面的考古發現可以相互印證。^[32]基於以上對於大衛王朝的考古學證明，對於大衛王國的歷史存在事實已經形成普遍共識。

於是，在大衛及所羅門的王國統治下，特別是所羅門建造的聖殿成為以色列人向上帝祈求、悔罪的唯一聖地，以色列人原先在曠野時期形成的以西奈律法為代表的「誠命傳統」逐漸被替代，有形的聖殿以及圍繞著聖殿而衍生的崇拜禮儀成為以色列的宗教和國家生活中的中心。

總的來說，通過對以色列人進迦南的考古學歷史的研究，發現在以色列民族進入迦南之前，迦南人的信仰也是充斥著操縱神靈、人祭童祭的宗教儀式和行為，以色列民族對於迦南地的征服，不僅逐漸用一神信仰取代了多神信仰，也在曠野中建立起來的包含律法、禮儀和教化在內的新的宗教，取代了通過宗教儀式操縱神靈的人祭制度等舊的宗教傳統，這是文明變遷進程中信仰文化因素發揮深層影響的又一例證。

四、在天人之際思考文明與野蠻

人祭現象在早期人類歷史中並非罕見現象，如地中海克里特島曾發掘出一座 3000 多年前的石砌神殿，這裡意外保存了一幕人祭的現場；克里特島一座米諾斯文明晚期建築出土了 300 多塊人骨，據發掘者推測是烹飪獻祭後吃剩的骨頭；《舊約》中亞伯拉罕用長子獻祭的記載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東地區古老風俗習



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記載了玄奘去印度求法途中險被殺祭的遭遇；西班牙殖民者曾為後世留下美洲阿茲特克人在石砌金字塔神廟的頂端舉行獻祭儀式的記錄；^[33] 近代考古陸續發掘出的甲骨卜辭和祭祀遺跡再現了中國殷商時期的人祭現象。^[34] 這些人祭現象都在外來文化的干預下逐漸消亡，如羅馬人後來皈依了基督教，阿茲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所信奉的天主教所取代，而周公等人則通過一套新的宗教道德體系抹除了殷商的人祭宗教，由此轉向「敬鬼神而遠之」的有神論的人文主義。

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人通過祭獻同類以祈求得到神的護佑，實際上是在「天人相關」的預設下將自己的欲求透過「天」折射於人間，這種試圖以人為方式操縱神靈為自己謀求天命、權力、財富等的做法，往往會混淆「天」與人的行為界限，激發種種虐殺分食的野蠻行為，導致人類社會陷入黑暗之中。摒棄人祭無疑是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歷程，但這一歷程並非是因著對鬼神的絕對驅除而實現的。一些地區在反思天人關係的基礎上，重新接受了一種新的宗教價值體系如基督宗教的上帝觀，還有一些地區從有神論的人文主義出發尋求天人秩序的建立如周禮孔學，因而人祭現象實際上是隨著天人秩序的重新確立而最終退場的。因此，人類歷史中文明與野蠻的界限並非人與神的絕對分隔，而在於天人秩序的確立，這在世界近現代文明的發展歷程中也得到印證。

社會學家孔德 (Auguste Comte) 曾預測知識與社會的發展經歷三個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實證階段。^[35] 孔德相信知性失序是社會失序之主因，唯有實證主義全面接管知性，才能解決失序問題。而事實上，實證科學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過度推崇實證科學反而容易導致泛科學觀的產生，引發種種社會弊病。以近代中國為例，在國家面臨內憂外患之際，五四知識分子喊出「科學萬能」的口號，過度推崇科學使得中國長久存在一種「泛科學觀」的心態，即堅持感官經驗是驗證一切可信知識的唯一標準，拒絕接受人類經驗中的諸多面向如宗教、道德、藝術等，武斷地將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加以

取消，導致人對社會的認識有偏狹，這也隨之引發了政治、社會中的種種流弊。^[36] 可見，知性失序的問題不是因為神學與形而上學，而是知性跨越其界限而導致的，同時也說明實證科學的發展並不必然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也不必然意味著社會文明的持續進步。

而另一方面，被視為阻礙的神學與形而上學卻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文明進程，如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產生與發展與基督教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西方自由主義的早期發展主要是以17、18世紀的英美自由憲政運動為主幹的，而這一運動從起始就和新教中的加爾文派有密切關係。具體來說，加爾文教派在16、17世紀的英國發展為清教徒教會，其教義中神是至善、人是罪惡的觀念在政治上體現為清教徒的互約論，這一思想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的憲政革命，同時隨著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數量的不斷增加，也進一步成為美國自由憲政思想的重要思想泉源。^[37] 由此可見，神學事實上也是對天人秩序的一種審視，其對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神學與實證科學不能成為野蠻與文明的判斷標準。

人類早期歷史中並不罕見的人祭現象，基於人對超越事物的無限崇拜與肆意操縱而出現，同時又隨著天人秩序的重新確立而退場。即使到了19、20世紀，實證科學空前發達，天人秩序的破壞也導致了人類社會秩序的極大破壞。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高舉科學的旗幟，卻忽視了人類經驗中的其他面向，導致社會中久久瀰漫著一種「泛科學觀」的心態，產生了種種社會弊病。西方自由民主的憲政思想可謂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其產生與發展卻與基督教神學思想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所以，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邏輯不在於對鬼神的驅除，而在於對天人秩序的重新審視。換言之，文明的進程不是實證科學對於神學和形而上學的驅逐，而是天人秩序的確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新的文明的建立。

五、小結

《翦商》以人祭現象為歷史線索，在勾勒早期華夏文明之出現與發展圖景的基礎上，聚焦於

商周更迭之際廢除人祭背後的歷史真相，顛覆了「人祭是逐漸、自然、不知不覺地退場的」的看法，將人祭風俗的消亡歸因於周朝幾位開創者，尤其是周公旦的努力，並最終認為殷周之際朝代更迭、文明變遷的背後有著更為深層的信仰文化因素。事實上，與此類似的信仰「革命」並非孤例，從當前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考古學研究中可以發現，以色列民族征服迦南後用在曠野中建立起來的包含律法、禮儀和教化在內的新的宗教，取代了通過宗教儀式操縱神靈的人祭制度等舊的宗教傳統。由此引發進一步思考，信仰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社會學家孔德曾預測知識與社會的發展經歷三個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實證階段，並相信知性失序是社會失序之主因，只有實證主義全面接管知性，才能解決社會失序問題，這實際上否定了信仰在文明進程中的意義與價值，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一方面，人通過祭獻同類以祈求得到神的護佑，是在「天人相關」的預設下將自己的欲求透過「天」折射於人間，這一天人秩序的破壞往往由一種新的信仰體系重新確立，而非通過對鬼神的驅除。另一方面，從近現代文明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實證科學並非醫治社會百病的「萬能藥」，被視為阻礙的神學及形而上學反而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

宗教是一個從古到今客觀存在的歷史文化現象，一旦人類（特別是統治者）試圖以人為的方式操縱神靈的作為，為自己謀求天命、權力、財富等，人類社會就不免陷入黑暗之中。在幾次文明的歷史變遷中，通過追問「革命」所造成的文明的斷裂，可以窺見其背後更為根本性的神聖邏輯。人類文明的進程，並非如孔德所預測的經歷三個階段，而事實是，人類社會的每個階段都會有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科學。知性失序的問題不是因為神學與形而上學，而是知性跨越其界限而導致的。例如，十九世紀以來，實證科學的極大發展並沒有消除世界的失序問題，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呈現出一種在宗教、哲學、社會、政治上試圖扮演上帝而導致的人類社會在信仰、理智、道德、社會國家秩序上的黑暗。因

此，文明的進程並非實證科學對於神學和形而上學的驅逐，而是天人秩序的確立，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新的文明的建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33] [34] 李碩：《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8-19頁。第29-33頁。第70頁。第119頁。第127-128頁。第12頁。第393-394頁。第408頁。第412頁。第341頁。第338頁。第385頁。第386頁。第386頁。第465頁。第455-457頁。第484頁。第487頁。第519頁。第537頁。第554頁。第550頁。第13-14頁。第14頁。

[23] [25] [28] [29] [30] [31] [32] 游斌：《聖書與聖民：古代以色列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構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28頁。第190頁。第95頁。第96頁。第150頁。第240頁。第240-248頁。

[24] [26] [27] 游斌：《希伯來聖經的文本、歷史與思想世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26-127頁。第119-120頁。第120頁。

[35] 孔德著，黃建華譯：《實證研究》（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36]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8頁。

[37] 同上，第27-29頁。

Religious Archaeology of Civilization Change
Han Siyi, Zhang Ji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Jian Shang (Revelation)* has sparked h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ince its publication. The book uses the phenomenon of human sacrifice as a historical clue, not only outlining the basic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newal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truth behind the abolition of human sacrifice at the tim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Shang to Zhou. 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deeper faith and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is civilization change. This faith “revolution”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By examining the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Israelites’ conquest of Canaan, it also triggered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not a three-stage process as predicted by Comte. On the contrary, there will be theology, metaphysics and empirical science in every stage of human society.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disorder is not caused by theology and metaphysics, but by the intellectual crossing their boundaries.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expulsion of theology and metaphysics by empirical science,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rder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scientific spirit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Jian Shang (Revelation)*, human sacrifice, religious archaeology, order between heaven and man